

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

——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

李培林 张翼

本文是对失业下岗职工走出生活逆境途径的探讨。以往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市场需求和制度安排对就业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开创了一个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互动作用的新历史，在对外开放扩大、市场化转型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面对同样的社会事件，人们有了更大的通过调整自己的选择来改变生活的可能性。基于2002年8—9月对辽宁省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约1000个样本下岗职工的抽样调查，作者发现，与一般的常规推论相反，在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了断裂。所以，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在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对下岗职工转业转岗的培训，以增强其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能力，帮助他们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

关键词 失业下岗 人力资本失灵 收入决定 阶层认同

作者李培林，1955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张翼，1964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缘起

人到中年，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意味着事业有成、生活稳定，但对一些特殊的群体，则是一种略带沧桑的悲壮。中国40—55岁这个年龄段的中年群体，在人生的旅途上大都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坎坷，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在其人生轨迹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如今又有了从下乡到下岗的经历。在那些下岗失业问题严重的老工业基地城市，流传着“40、50岁现象”的说法，意为那些年龄在40—50多岁的下岗失业职工，往往会因为年龄关系而成为一个再就业特别困难的群体，而摆在他们生活道路面前的，又是养老金有无着落、看病如何缴费、子女的学费是否付得起、高堂父母怎样供养等一系列难题。我们属于这个年龄段中幸运的一群，希望能够以学术研究这种自身的职业方式，来为帮助他们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提供建设性意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实行国家安排工作的充分就业政策，失业几乎成为陌生的集体记忆。1978年中国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试点。

初期的改革，几乎表现为一个普遍获益的过程，即参与变革的每个社会阶层，都从改革带来的发展成就中得到实惠，尽管收入的差距开始拉大，但每个社会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以至于这种特征被经济学家概括为“帕累托改革”（Pareto Reform）。但是，沿循放权让利思路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进展缓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更重要地表现为非公有经济的迅速成长。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结束短缺经济时代，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市场的变化，使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成为必然。在市场化 and 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触动利益刚性的就业保障领域，过去国有企业隐含的富余人员，很快以大量职工下岗的方式凸现出来。在大多数人收入上升的同时，很多下岗职工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的理解和宽容，成为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从1996年到2001年，中国累计的下岗职工有2500多万人。到2002年，中国失业和下岗人员还有约近1400万人，下岗和失业职工带来的生活问题涉及几千万城市家庭人口。下岗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就业体制市场化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它与失业的定义有差异。就平均情况来看，下岗人员的经济状况略好于失业人员。从2000年开始，中国加速了就业体制市场化改革，实行下岗与失业的体制并轨，但这一改革在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集中的老工业基地，特别是资源枯竭的老工业基地城市，遇到很多具体困难。2001年，国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省进行社会保障改革试点，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下岗与失业的体制并轨。从2001年7月到2002年7月底，辽宁省实现并轨的总人数达到73.6万人，其中2001年实现并轨的人数达到52.5万人，人均领取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只有7340元。到2002年年底，某些省市已经关闭了所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和失业基本完成体制并轨，今后新的失去工作岗位的职工将直接视为失业。同时，这个过程也在其他下岗问题严重的地区展开，“下岗”将逐步成为一个历史性概念。然而，由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和资本的增密以及劳动力供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都将处于就业紧张状况。而且，一旦出现危机事件对经济的冲击，就业脆弱的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例如由于中国非典疫情的影响，1500万采取灵活方式再就业的失业下岗人员遭到严重冲击，800万左右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被迫暂时返乡。

二、理论探讨和假设的提出

在过去研究重大社会变迁与个体生活历程关系的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就是分析宏观的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历程的影响。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

虽然每一个国家使用的失业概念不尽相同，但国际劳工组织在1982年国际劳工大会上给失业所下的定义具有经典意义。其将失业标定为：在调查期内达到一定年龄并满足以下条件者：（1）没有工作，即未被雇佣同时也未自雇者；（2）具有劳动能力，即完全可以被雇佣或自雇；（3）目前正在寻找工作，即已经采取明确步骤寻找工作或自谋职业。在这里，为大多数人所同意使用的“调查期”是一个月（过去的30天），倘若调查期不同，得到的失业率就不一定相同。而“下岗”指的是失去了原工作岗位，但仍与原国有或集体企业保持着劳动关系，并在原企业“再就业中心”领取生活费的人。事实上，还有一大部分原国有企业职工，虽然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而是离开了原单位，但也与原单位保持着劳动关系，这些人被称为离岗职工。正因为企业在裁减冗员时灵活地采取了多种办法，所以，许多企业在统计与其保持劳动关系的职工数额的时候，将仍然工作在本企业的职工称为“在岗职工”，将因各种原因离开工作岗位的职工统称为“不在岗职工”。

李连仲：《非典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与对策》，《经济日报》2003年6月23日。

意义，他分析和描述了 1920 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对美国那一代孩子生活历程的影响，周雪光和侯立仁的《文革中的孩子们》，则把这种理论视角引入到对中国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他们通过对问卷的数据分析，测算了 1960—1970 年代“文革”中“上山下乡”对那一代人后来的职业和生活的影响。这些研究比较侧重于强调社会结构变动对个体生活历程的决定性意义。

我们这里的研究则试图从一个相反的理论视角入手来考察事件史，即注重考察个体的禀赋、意愿和行动对改变自身生活轨迹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建构意义。因为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开创了一个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互动作用的新历史，在对外开放扩大、市场化转型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面对同样的社会事件，人们有了通过调整自己的选择来改变自身命运的更大可能性。

1. 人力资本对收入地位的意义

在以往的地位获得研究中，就平均情况而言，在决定个人收入地位的诸多个人禀赋中，人力资本是最被强调的一个因素。各种关于社会结构转型趋势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产业发展的知识化和信息化，人力资本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国内外无数的研究都证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与其工作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

尽管不同的学者在定义人力资本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得不使用这样几个容易获得的指标：第一，受教育所取得的文凭或在全日制学校读书的年限；第二，接受职业培训的时间长短；第三，身体的健康程度。事实上，在缺少后两个指标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往往以第一个指标测量人们所取得的人力资本。

社会学家在分析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时，也将“受教育程度”这个人力资本变量作为最主要的自变量考察。例如，具有经典意义的各种地位获得模型都表明：受教育水平对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涉及该领域研究的一项近期成果也发现，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对劳动者的收入回报在逐渐上升。另外一项专门考察台湾个人受教育程度对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趋向。

然而，我们在对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的访谈中发现，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下岗人员找工作并不是更容易，或者找到工作后的收入并不比文化水平低的人高，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力资本的失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大转折时期，

G. H. Elder,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Zhou Xueguang and L.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 vol. 64, pp. 12—36.

T. W. Schultz,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G. S. Becker, *Human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Blau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 D. J. Treiman and K. -B. Yip,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 in M. L. Kohn (ed.),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Sage, 1989; R. Erikson and J. H. Goldthorpe,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R. Bond and P. Saunders, Routes of Success: Influences on the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of Young British Mal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50 (2): 217—249.

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 1988 年和 1995 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章英华、薛承泰、黄毅志：《教育分流与社会经济地位》，《教改业刊》（台北）1996 年 AB09。

会发生劳动力市场“知识技能系统”的改变，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断裂”，即原有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新的“知识技能系统”需求中不再明显地发挥作用。就像目前面对迅速变化的就业市场的大学生，虽然都是大学毕业，但由于掌握的“知识技能系统”不一样，通过求职所获得的地位与收入就可能存在天壤之别。雅库波维奇等在研究俄罗斯市场转型过程中发现，人们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寻求新的市场就业岗位时出现了迅速“贬值”的情况。赵延东 2000 年对武汉下岗职工的调查也表明，下岗职工下岗前的人力资本（职称与技术级别），对其再就业质量（新工作的工资收入、职业声望、满意度等）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据此，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在知识技能系统的大转变时期，某些人会出现人力资本对收入地位解释的失灵现象，而“文革”中中断学习的一代，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最为严重。

2. 人力资本对阶层认同的意义

众多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结果证明，阶层认同（Class Identification）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受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社会声望乃至年龄、性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与收入决定的客观阶层地位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如以往的有关社会调查发现，人们对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主观感知和定位，常常偏向于中层。在性别区分上，与男性相比，同样收入水平的女性，会有更多的人将自己认定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上。

正是这种差异使阶层认同或阶级意识的研究变得格外重要，因为在个人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及行为动机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关性联系或因果性联系。但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态度的一致性是不同的，而经受社会压力较大的社会阶层，社会态度的一致性会更高。用奥尔森的话说，较小的或具有外部压力的群体，更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一致的行动。

以往的众多研究提出的假设虽然不同，但比较一致的验证结果是，人力资本与阶层认同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影响人们阶层认同的因素，在传统社会中，家庭背景、身份等先赋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大，而在现代社会中，则是文化程度、职业等获得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布劳和邓肯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中着力刻画的图景是，教育对人们的阶层归属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章英华等在《教育分流与社会经济地位》一书中也指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自己的阶层认同也越高。黄毅志在研究台湾社会人们的阶级认同时也有同样的发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变化也表明，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升迁的贡献在不断增加。可是，考察下岗职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我们却发现，“受教育年限”这个重要的获得性因素，对其阶层认同的解释力减弱或消失了。我们在实地的访谈调查中感觉到，下岗职工的阶层认同的一致性较高，但与人力资本的相关性较低。这与我们对进城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有较大差

V. Yakubovich and I. Kozian, *The Changing Significance of Ti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Hiring Channels in the Russian Transitional Labor Market*,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1, 15: 475—500.

赵延东：《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2001 年博士论文，第 63 页。

L. Beeghly,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6.

M.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Blau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

章英华、薛承泰、黄毅志：《教育分流与社会经济地位》，第 97—99 页。

黄毅志：《社会阶层、社会网络与主观意识》，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 年，第 38—39 页。

异——对进城民工的一项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自我认同的社会阶层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下岗职工与进城民工的收益变动曲线是不同的，前者的收益曲线是下滑的，而后者是上升的。

据此，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对于收益曲线下滑的群体，会发生人力资本对阶层认同解释的失灵现象，而且越是收益曲线下滑严重的人群，人力资本失灵情况越严重。

3. 下岗失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以往的很多研究还发现，失业率的上升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薄一波在分析建国初期（1950—1952年）失业高峰期的社会状况时就曾坦言：“1950年春夏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很多企业关门倒闭，全国14个较大城市工厂倒闭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商店9345家，失业工人逾百万，人心浮动，‘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迅速蔓延’”。

另外，无业和失业与犯罪率的关系也经常被提到，“据上海、天津、南京三市公安部门统计，仅1993年7月至1994年6月一年间，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抢劫、强奸、流氓斗殴等各类案件中，平均有56.4%以上系城镇失业青年和闲散在家的企业下岗职工所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目前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威胁最大的大众群体，不是处于最底层的城乡贫困人群，而是失业或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他们的地位同时出现大幅度的绝对下降和相对下降，因此他们的不满最为强烈。李普塞特在论述到贫苦工人的政治取向时也曾说到：“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可能感到难以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尽管下岗职工的社会态度总体上一致性较高，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很难单纯用经济地位或在业还是失业来解释。不同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下岗职工中隐性就业的比例达30%—60%。在我们这次调查的抚顺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调查统计数据 displays，约有50%的下岗职工“稳定”再就业；约20%的下岗职工“不稳定但经常”能够找到工作；约10%的下岗职工“就业不稳定”并经常失去工作；干脆“什么也没有干”的下岗职工只有20%左右。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人力资本的提高与社会态度的理性化相联系，我们在调查中却感到：文化程度高，而收入与阶层认同较低的下岗职工，似乎更容易产生社会不满情绪。因为由于人力资本对收入与社会地位解释的失灵，他们对收益下降的不满感受更强烈。

据此，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对于收益曲线下滑的群体，人力资本对收入与社会地位解释的失灵情况越严重，其对现有社会的不满程度就越强烈。

4. 人力资本与生活发展前景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尽管存在着个人无力扭转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安排，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市场化的深入，凭借个人的知识才能、努力奋斗、机会把握等因素而改变生活发展前景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最终也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个人发展的因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2—163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4—95页。

汪大海：《挑战失业的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李普塞特（S. M. Lipset）：《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素。当今社会知识技能系统的快速变化，使人力资本的积累呈现为一个终身不断学习的过程，为了避免人力资本的断裂和失灵，就要不断地改善知识结构和提升工作技能。对于普通的下岗失业职工来说，通过某些富有实效的转岗转业培训，提高和转化他们的“知识技能系统”，使其适应于市场的需要，可能是帮助其走出生活逆境阴影的最可行选择。

据此，我们的第四个假设是：在收益曲线下滑的群体中，那些经过转岗转业培训，改变了个人的“知识技能系统”，并使自己的人力资本适应于市场需求的人，更有可能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

三、数据与变量介绍

1. 数据来源

为深入研究下岗职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和社会稳定状况，探讨帮助下岗职工走出生活逆境的途径，我们于2002年8月下旬和9月上旬，分赴辽宁省4个下岗职工既集中又难于再就业的资源枯竭型地级市进行调查，这4个城市分别是抚顺、本溪、朝阳和阜新。调查分为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访谈以开座谈会与入户调查两种形式为主，辅之以其他。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政府政策研究室、劳动保障局、计划委员会、统计局、工会、妇联、街道办事处、下岗职工集中的企业等单位以及社区的有关负责人和部分下岗职工代表。在入户访谈中，先由社区主任介绍情况，然后选择比较困难的下岗职工家庭入户访问，获得感性认识。

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个案。每一个市独立抽样。为了回避以企业为调查单位所造成的选择同质性问题，增加个案选择的区位均衡性，我们首先在当地民政部门提供的社区名册中每城市随机抽取38—40个社区，然后再在抽取的社区中随机抽取6—7名下岗职工作为被访问对象，完成问卷调查。4城市共访谈1110个下岗职工，获得995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到90%。样本结构性特征的统计描述，请参见文章的附表。

2. 变量介绍

在分析中我们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验证假设。在自变量的使用上，我们在不同的模型中，有时候会将定距变量和定序变量作为类别变量虚拟化处理，有时候会在不分组别的意义上作为定距变量处理。

我们使用的自变量主要是受教育程度（有时以被访问者在学校经历过的受教育年限来处理，有时以被访问者既已取得的学历文凭级别来处理）、年龄（有时以实际年龄大小做连续性变量来处理，有时又分类为年龄组别来处理）、技术级别、政治身份、性别、有收入劳动的工作时间等。

我们在研究中设计的因变量分别是：下岗前月工资收入、下岗后再就业月收入、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阶层认同”和“不稳定状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阶层认同”和“不稳定状况”属于主观变量，来自于下岗职工的自我感知。“阶层认同”的问题是这样设计的：如果将全社会的人群分为高低不同的6个阶层，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给出的选择是：上上层、上下层、中上层、中下层、下上层、下下层。自赛特斯开创性地使用这一调查内容以来，它已成为

由于下岗职工的流动性较强，过去的有关调查多数是采取主观抽样。这次调查是迄今为止有关下岗职工的问卷调查中，抽样比较规范、数据质量较好的。尽管只是区域性的调查数据，但本文所着重的有关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应当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经典性的题目。“不稳定状况”也是一个主观性问题，是“对参加集体上访的态度”、“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对干群关系的评价”、“对当地经济景气程度的感知”、“对下岗失业问题缓解时间的感知”等相关性很强的一组变量的因子合成。

四、研究过程和结果

1. 收入决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

下岗职工下岗前的收入，无疑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在企业层次上，会受到企业盈利率、企业工资水平和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个人层次上，会受到工作岗位、工龄长短、加班多少等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假设关注的是人力资本对收入获得的影响，即对于下岗职工而言，其下岗前和下岗后的收入状况会发生什么变化。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们以最小二乘法所做的线性回归模型，反映了人力资本对被调查者收入的影响。在这里，“性别”和“是否党员”对下岗职工下岗前和下岗后的收入，都具有显著影响意义。男性的收入高于女性，党员的收入高于非党员，这在其他调查中也有所验证。

表 1 模型 1 的结果显示：“受教育年数”这一变量对其“下岗前月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即“受教育年数”越长，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下岗前的月收入就越高。在这个模型中，“年龄”也具有显著影响意义，年龄越大，下岗前的月收入也越高。在国有企业中，年龄的大小就直接预示着工龄的长短，工龄又反过来影响着工龄工资，也影响着一个职工从企业获得的福利水平。在将技术级别做虚拟变量处理后，虽然高级工的技术级别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中级技术工人和初级技术工人的技术等级与其月收入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著的。这就是说，与无技术级别的职工相比，有技术级别的职工，其技术级别对其收入的提高都有贡献。

如果将“受教育年数”、“年龄”和“技术级别”作为人力资本来看待的话，下岗职工在下岗前的月工作收入，受着人力资本的支持，即人力资本越高的职工，其工作收入就越高。

考察表 1 的模型 2，当因变量改变为下岗职工“干目前的工作所获得的再就业收入”时，情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受教育年数”对其收入的正向效应消失了，即其对收入的影响变得不具统计推断意义。第二，下岗职工的“年龄”对其再就业收入的影响，变成了负向影响，即下岗职工的年龄越大，其再就业收入就越少。这种现象恰恰与模型 1 所得出的推论相反。

为了对表 1 模型 2 中出现的“人力资本和年龄对下岗后工作收入具有负向影响”的状况做深入探讨，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检验了“20—40 岁”和“41—55 岁”两个年龄段的被访问者的收入决定状况。

赛特斯在问卷中这样提问：“如果你必须用中层、下层、工人层、上层这几个名称来说明你的社会阶层，你属于哪一个？”参见 R. Centers,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 A Stud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233。

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 1988 年和 1995 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

关于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谢宇与韩怡梅在考察 1988 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收入是正相关的，但由于奖金和补贴的平均发放，经济增长对教育回报率有负面影响（参见谢宇、韩怡梅《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与地区差距》，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联书店，2002 年，第 460—508 页）。而赖德胜的研究表明，从 1988 年到 1995 年，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从 3.8% 提高到 5.7%，而且教育收益率高于工龄收益率（参见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第 451—474 页）。

张翼：《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90—200 页。

表1 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模型 (OLS 标准净回归系数)

因变量	下岗前月收入	下岗后再就业收入 (即“干目前工作的上个月收入”)		
	模型 1	模型 2 (所有年龄段)	模型 3 (20—40 岁)	模型 4 (41—55 岁)
自变量				
上周工作时间		0.383***	0.378***	0.608***
性别	0.167***	0.146***	0.183***	0.086
是否党员	0.142***	0.155***	0.213***	0.130
受教育年数	0.082*	0.025		
文化程度分组别				
对照组: 小学及以下				
初中			- 0.282	0.015
高中与中专			- 0.252	- 0.068
大专			- 0.006	- 0.129
本科			0.010	- 0.029
年龄				
不分组别	0.089*	- 0.073**		
下岗前职业身份				
对照组: 其他人员				
管理人员			0.111*	- 0.028
技术人员			- 0.005	- 0.029
生产人员			0.086	- 0.081
服务人员			0.006	- 0.106
技术级别				
对照组: 无级别				
高级工	0.061		- 0.001	- 0.213***
中级工	0.147***		- 0.002	0.027
初级工	0.072*		- 0.047	- 0.031
F 值	13.712***	35.21***	10.16***	8.24***
确定系数 R ²	0.114	0.213	0.283	0.447
调整后 R ²	0.109	0.207	0.254	0.392

注: ***P<0.001 **P<0.01 *P<0.05

表中下岗前职业身份中的对照组“其他人员”,包括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等,下同。

从表1模型3可以看出,对“20—40岁”这个年龄段的下岗职工来说,文化程度、技术级别和年龄对其再就业收入都失去显著影响。在“下岗前职业身份”类别中,只有那些“管理人员”与“其他人员”相比,才显示出了收入优势。但从总体上来看,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对其下岗后的“再就业收入”,失去了解释意义。

在表1模型4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更有意义的现象:对于“41—55岁”年龄段的下岗职

工来说,在模型 3 里发挥显著作用的两个自变量——“性别”和“是否党员”,也失去了对再就业收入的统计解释力。也就是说,在深受“文革”影响而中断了学业,一般又具有“上山下乡”经历的那些 40 岁以上的下岗职工中,“男性”与“女性”相比,“党员”与“非党员”相比,其“下岗”后的再就业月收入,失去了比较优势,不具统计推断意义。而“高级工”的技术级别,与“下岗”后再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反倒呈负向影响关系,即与“无级别者”相比,在第二产业中获得过高技术级别的下岗人员,在服务业——第三产业中的再就业收入反而较低。这使我们想到 1999 年在长春市进行下岗职工访谈时一位 49 岁省级劳模的话:

我下岗之后,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工作。最初的那段时间,是最难受的。我一连睡了将近一周。我爱人类似于残疾人,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我们瓷器厂的人,原来工作的生产线比较特殊,我也没有什么在别的厂子工作的经验,工作是特别难找的。……我在下岗的第二周,才到市里去找工作。说是找工作,实际是蹲马路牙子,我只能替人刷房子嘛。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找工作的,他说让我一起去,我就去了。那一天没有人来叫我们,我们白等了一天,搭了些路费和午饭钱就回来了。第二天我们换了一个地方等,算是有人来找,就干了一天活……

下岗职工收入决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在社会流动的链条上,人们必须凭借自己累积的人力资本和努力,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地位,这是人们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一种社会信念。但在“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从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原因而不是自身的原因,去理解影响自己进入和走出生活逆境的因素。

2. 阶层认同中的“人力资本失灵”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下岗职工中,认为自己属于“上上层”和“上下层”的只占 1.1%,认为属于“中上层”的占 3.5%,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 15.7%,而认为属于“下上层”的占 35.2%,认为属于“下下层”的占 44.5%。那么,主要是什么因素影响下岗职工的阶层认同呢?

表 2 的模型 1 表明,对下岗职工“阶层认同”具有统计影响意义的,主要是自己“下岗后再就业月收入”和“配偶的月收入”,而受教育年数失去了对阶层认同的解释力,尽管相对于对照组“无级别”工人而言,“高级工”更易于将自己认定在比较高的阶层地位上,但这些人占下岗职工总人数的比重较少。

表 2 模型 2 和模型 3 是针对男性下岗职工而做的检验。这个验证表明,在不考虑配偶的情况下,对于男性下岗职工的“阶层认同”最有统计解释力的变量是“再就业月收入”;而当我们加入“配偶的受教育年数”和“配偶的月收入”加入自变量后,却发现“配偶受教育年数”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配偶月收入”的影响则具有统计显著意义。

表 2 模型 4 和模型 5 是对女性下岗职工的验证。在模型 4 中,对“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意义的自变量是“下岗后再就业月收入”和“自己的受教育年数”。可模型 5 加入了“配偶的受教育年数”和“配偶的月收入”之后,“自己的受教育年数”就变得不显著了(不但达不到 5% 的显著水平,而且标准净回归系数也很小)。这个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模型 1 的推论,即妻子的阶层认同,会更多地依附于丈夫的工资收入。

表 2 下岗职工的阶层认同模型 (OLS 标准净回归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所有个案	男性	男性	女性	女性	20—40 岁	41—55 岁
下岗前月工资收入	0.019	0.108	0.092	0.027	-0.021	-0.025	0.048
下岗后再就业月收入	0.213***	0.336***	0.237***	0.241***	0.201***	0.224***	0.236***
技术级别							
对照组: 无级别							
高级工	0.174***	0.080	0.116*	0.140*	0.216***	0.177***	0.165**
中级工	0.034	0.048	0.020	0.040	0.035	0.070	-0.020
初级工	0.014	-0.030	-0.017	0.012	0.001	0.037	0.005
是否党员	0.008	0.050	0.002	0.067	0.037	-0.005	-0.007
自己的受教育年数	0.003	-0.023	-0.068	0.134*	0.059	-0.065	0.109
自己的年龄	0.007	-0.031	0.023	-0.047	-0.003		
配偶的受教育年数	0.072		0.040		0.110	0.128	-0.010
配偶的月收入	0.269***		0.162***		0.277***	0.308***	0.241***
下岗前职业身份							
对照组: 其他人员							
管理人员						-0.065	-0.097
技术人员						-0.082	-0.223**
生产人员						-0.042	-0.109
服务人员						-0.111**	-0.216*
F 值	14.683***	7.497***	4.98***	7.74***	10.71***	7.51***	5.31***
R ²	0.201	0.161	0.155	0.146	0.263	0.224	0.224
调整后 R ²	0.187	0.140	0.124	0.127	0.239	0.194	0.182

注: ***P<0.001 **P<0.01 *P<0.05

表 2 模型 6 和模型 7 比较了“20—40 岁”和“41—55 岁”两个年龄段下岗职工的阶层认同决定状况。可以看出,对于那些在“文革”时期受“上山下乡”影响而可能中断教育的群体而言(41—55 岁年龄段下岗职工),与“对照组——其他人员”相比,他们中的“技术人员”却在统计意义上对自己的社会阶层认定得更低,而这种情况在“20—40 岁”年龄段的下岗职工中表现得并不显著。

综合考察这几个模型就会发现:下岗职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影响其“阶层认同”的因素,主要是“下岗后再就业月收入”和“配偶的月收入”。所不同的是,女性更加依附于丈夫的收入。人力资本(受教育年数)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总体上是不显著的,而且那些收益曲线下滑越严重的群体(41—55 岁年龄段下岗职工),其人力资本对自己阶层认同的解释力失灵的现象越突出。

3. 社会态度决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

一般来说，越是文化程度和年龄较高的群体，其社会态度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即越倾向于采取温和的社会态度。但对下岗职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说，由于生活经历中利益曲线的下滑，其社会态度的决定因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用以表示“社会态度”的，是一个因子合成的变量，主要合成因素是“对参加集体上访的态度”、“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对干群关系的评价”、“对当地经济景气程度的感知”、“对下岗失业问题缓解时间的感知”等，我们把这个因子合成的值称为“社会不稳定系数”。

表 3 社会不稳定系数决定模型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所有个案	20—40 岁	41—55 岁
性别	0.026	- 0.022	0.113
是否党员	- 0.053	- 0.056	- 0.029
年龄	0.142***	0.137*	- 0.076
阶层认同	- 0.335***	- 0.298***	- 0.412***
再就业月收入	- 0.147**	- 0.079	- 0.173*
受教育年数	0.122**	0.118*	0.120*
周工作时间	0.151**	0.085	0.204**
F 值	14.125***	5.816***	8.653***
R ²	0.179	0.141	0.234

注：***P<0.001 **P<0.01 *P<0.05

从表 3 的模型 1 可以看出，“性别”和“是否党员”对“社会不稳定系数”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阶层认同”、“再就业月收入”、“受教育年数”、“周工作时间”等对“社会不稳定系数”具有显著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我们的一般判断相左的是，越是受教育年数长和年龄比较大的下岗职工，对“社会不稳定系数”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其社会不满意度越高，越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从标准回归系数大小的比较上还可以看出，“阶层认同”对“社会不稳定系数”的影响力最强，由于前面我们已经验证了“阶层认同”上的人力资本失灵状况，这里可进一步说明社会态度决定上的人力资本失灵。

表 3 模型 2 和模型 3 比较了 20—40 岁和 41—55 岁两个年龄段下岗职工对“社会不稳定系数”的影响。可以看出，与 20—40 岁年龄段下岗职工相比较，人力资本积累断裂情况更加严重的 41—55 岁的下岗职工，其“阶层认同”对“社会不稳定系数”影响更大，其“受教育年数”对“社会不稳定系数”也更具负面的影响。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受教育年数越长、年龄越大的人，对利益曲线下滑形成的对比感受越强烈，也越容易采取激烈的社会态度和集群行动。所以，年龄段较高的下岗职工，尤其是那些过去有“上山下乡”经历、如今又有了“下岗”经历的人，是特别需要帮助接续其人力资本积累链条的一群人。

4. 转岗转业培训：帮助下岗职工走出困境的一种选择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清晰地折射出中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传统产业的收缩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这种调整也带来就业市场上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编码系统”的改变，从而导致一部分人原有的“人力资本”失灵。因此，下岗职工通过转岗转业培训，接续人力资本积累链条，转换和更新知识技能“编码系统”，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就成为下岗职工走出生活

困境的一种有效选择。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参加过转岗转业培训的下岗职工，更容易找到具有体面收入的工作。

调查统计结果也表明，受过转岗转业培训的下岗职工，生活境况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好转。表4以列联表的方式，报告了“参加过转岗转业培训”的下岗职工与“没有参加过转岗转业培训”的下岗职工的区别。在每一个因变量的下面，也给出了皮尔森卡方检验的显著性值（因为因变量给出的选择不同，所以，各个卡方检验中的自由度存在着差异）。

对“您或您家的生活水平在过去5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个问题，参加过培训的群体与没有参加过培训的群体比较，“提高很多”和“提高一些”的百分比都相对较高，而“差不多”、“下降一些”、“下降许多”的百分比都相对较低。这说明，转岗转业培训对下岗职工及其家庭过去5年的生活，发生了相对积极的影响。

对“您目前的收入与您下岗前所在单位的全部收入比较有什么变化”这个问题，虽然参加过培训与没有参加过培训的下岗职工相比较，在“高于原岗位收入”上区别不大，但在“差不多”和“低于原岗位收入”这两个变量上，则差距甚大，前者分别为30.8%和63.8%，而后者则分别为20.0%和74.4%。这就是说，参加过转岗转业培训的群体，再就业的收入明显地要比未参加者高一些。

表4 转岗转业培训对下岗职工摆脱困境的帮助作用

	参加过转岗 转业培训	没有参加过转 岗转业培训	总 计
您或您家的生活水平在过去5年来发生的变化			
提高很多	4.1%	1.6%	2.0%
提高一些	13.8%	7.8%	8.8%
差不多	20.0%	22.5%	22.1%
下降一些	26.9%	27.7%	27.6%
下降许多	34.5%	37.5%	37.0%
不知道	0.7%	2.8%	2.5%
对自变量的皮尔森卡方 检验： $X^2 = 12.53$; D. F. = 5; $P < 0.05$			
您目前的收入与您下岗前的全部收入比较			
高于原岗位收入	5.4%	5.6%	7.2%
差不多	30.8%	20.0%	21.8%
低于原岗位收入	63.8%	74.4%	70.9%
对自变量的皮尔森卡方 检验： $X^2 = 7.59$; D. F. = 2; $P < 0.05$			

总之，这里的列联表分析说明，转岗转业培训不仅有利于下岗职工再就业收入的改善，而且有利于帮助下岗职工的家庭走出生活的困境。

转岗转业培训作为一种谋生能力的培养和建设，目前是由国家作为社会帮助的示范来提供，但并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具有经费保证的制度化安排，而是由失业下岗职工自主选择参加。但无论是在地方政府还是在失业下岗职工个人眼里，培养谋生能力的转岗转业培训，都不如直

接的生活补助重要。但我们的调查分析则证明，谋生能力的培养，比单纯的生活救济，更有助于帮助失业下岗职工走出生活的阴影。单纯的生活救济可解燃眉之急，也可以在救济下暂时脱贫（根据“每天每人收入不低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1 美元”这个国际贫困标准），但返贫的几率很高，只有使被救济者具有自主谋生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境问题。

五、讨论与相关建议

在中国的大转变时期，快速的社会变动使人力资本失灵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而不仅限于失业下岗群体，只不过目前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多数人看到的是在市场化过程中人力资本作用的增强，较少注意到知识编码系统转换产生的人力资本失灵的后果。

在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具有决定个人生活轨迹的意义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尤其值得重视。中国亿万万个家庭，为了他们下一代的前程，愿意倾囊中所有，进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如果因为我们的教育供给与现代社会需求不适应，造成毕业后就失业，那将是千古之憾。但现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断裂而产生的人力资本失灵，已经造成大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浪费，很多学生目前花费巨大精力和财力学习的东西，是已经在就业市场上被淘汰的东西。在不同的大学、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课程设计之间，人力资本的含量出现巨大差异。随着个人教育支出在家庭消费中的快速增长，要防止人力资本投入的粗放经营、重复建设、效益低下甚至血本无归。

在市场化过程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而导致的失业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对于他们自身来说，是一种无奈和悲哀，对于社会来说，也是重大的损失。

人力资本的失灵也影响到下岗职工的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在人力资本积累断裂的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是决定于自己的知识技能水平和努力程度，而是决定于非个人的社会因素。这样，他们中人力资本较高的那些人，反而更容易滋生出较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换言之，在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下，不是穷人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而是人力资本失灵严重的穷人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

人力资本失灵已经成为失业下岗职工生活道路的一堵屏障和一个瓶颈，能否越过这道屏障、突破这个瓶颈，成为决定他们生活命运轨迹的关节点。如果能够跨过这道坎，接续人力资本积累的链条，弥合人力资本积累的断裂，那么失业下岗职工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工作经验、职业态度等等，就能够盘活，但如果跨不过这道坎，这些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反而可能会成为他们做出新的选择的包袱。盘活国有部门的人力资本，与盘活其物质资本实际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意义，目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是，失业下岗职工中的一部分，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态度，他们不再完全依赖社会和体制对自己生活的安排，而是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择，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正是这一部分人，其生活前景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也意味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升迁的机制在发生积极的变化，无数个体的积极行动，正在对新型社会结构的生成产生作用。

如果我们把下岗职工群体和进城农民工群体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尽管从收入地位和生活水平上看，后者并不比前者高，但后者的利益曲线是上升的趋势，而且人力资本效应显著，他们对于发展前景也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还很少发生进城民工的激烈的集群行为事件。而下

岗职工由于利益曲线是下滑的，又面临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因而对生活逆境的感受更为强烈。但后者目前生活态度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可能会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他们长期以来等、靠、要的选择，结束其个人命运完全由外在力量决定的历史。当年上山下乡的一代，不少人将生活的磨难转变为人力资本的财富，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脊梁。相信如今的下岗人员，也会有不少人从逆境中崛起，撑起未来的一片天地。

“下岗”也许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性概念，但就业紧张的状况还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并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将会成为一种常态的伴随现象。对于失去工作的那部分人，在统计上也许只占一个很小的百分比，或者可以用冷冰冰的“自然失业率”来表示，但对他们自身来说，那就是生活的全部。对少数困难群体的重视、帮助和扶持，是一个团结、和谐和公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失业下岗职工的帮助，当然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依据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补偿、补助，这无疑有助于缓解其在过渡期中的生活困境。但从长远考虑，特别是从个体选择和社会安排相互关系已经发生的积极变化考虑，更重要的还是为他们提供自食其力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需要向他们提供的，不仅是维持生存的粮食，更重要的是可以播种未来的种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受人瞩目的贡献就在于，他证明了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根本，不是简单地给予经济上的补助，而是提高人们个人选择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由于下岗职工过去长期生活在国家和政府安排就业的制度环境里，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在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和就业机会面前，他们往往感到缺乏选择的竞争力。而帮助他们提高选择能力和接续人力资本积累链条的转岗转业培训，在很多地方都流于形式，一些地方更习惯于运用容易立竿见影的“单位安排”方式来增加就业。

应当看到，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面对同样的社会事件，个人具有了更大的选择和改变自己生活的可能性。通过有针对性的转岗转业培训，改善和提高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的选择能力，使之适宜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需要，这是从根本上帮助下岗职工走出生活逆境阴影的一个有效的措施。而转岗转业培训对于失业者再就业的有效帮助，已经得到国际经验的普遍证明，改善人力资本对于从根本上减少贫困和返贫的有效性，也得到国际经验的普遍证明。

当然，一方面，今后在帮助失业下岗职工的总预算中应加大转岗转业培训投入的比重，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的使用更加具有效率，可以采取招标的方式，鼓励民间中介组织的参与，并把培训后的再就业率作为资金使用的考核指标。转岗转业培训作为帮助下岗失业职工走出生活阴影的重要措施，也还必须辅之以各种配套的政策，包括个人创业在税费、小额贷款、开业手续等各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过去，为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采取了各种优惠政策，现在，为了使仍然处于生活困境中的人也有能力富裕起来，更应当有充分的理由实行优惠政策。

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就业已成为今后几十年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我们期望在中国人自己塑造的安居乐业的“中国梦”中，有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有更多的人能够走出自己生活逆境的阴影。

附表 被访问下岗职工的描述性统计 (%)

自变量	年龄在 40 岁及以下		年龄在 41 岁及以上	
	1996 年以前下岗	1997 年及以后下岗	1996 年以前下岗	1997 年及以后下岗
女性	54.4	45.3	53.8	55.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0.5	0.4	1.9	1.6
初中及相当	64.6	49.0	61.4	44.8
高中、中专及相当	28.2	39.7	31.0	41.1
大专及相当	5.7	10.1	5.2	10.9
大学及以上	1.0	0.8	0.5	1.6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6.4	12.5	16.4	32.4
共青团员	15.9	15.6	2.6	0.7
民主党派	1.3	—	2.6	1.4
无党派	76.4	71.9	78.3	65.5
下岗前所在单位类型				
国有企业	34.4	52.3	34.4	46.9
集体企业	61.4	43.1	62.7	50.0
其他	4.2	4.6	2.9	3.1
下岗前所在单位行业				
农林牧渔业	1.4	0.4	—	1.6
采掘业	9.3	15.0	11.0	11.6
制造业	42.3	40.0	40.5	32.6
电力煤气及水生产	1.9	1.5	3.8	3.7
建筑业	8.8	6.5	11.4	6.8
地质勘察水利管理	1.9	1.5	1.9	0.5
交通运输仓储邮电	3.3	6.5	3.3	4.2
批发零售餐饮业	5.6	3.5	3.8	10.5
金融保险业	—	—	—	0.5
房地产业	—	—	0.5	—
社会服务业	4.2	3.1	5.2	9.5
卫生体育社会福利	0.9	—	0.5	1.6
文化教育广播电视	0.9	0.4	0.5	1.1
科研技术服务	0.5	0.4	0.5	0.5
党、国家机关与团体		0.8	—	0.5
其他	19.1	20.4	17.2	14.2
下岗前职业身份类型				
企业管理人员	5.3	5.4	10.4	17.4
专业技术人员	7.2	10.1	9.0	7.9
企业生产人员	58.2	56.4	50.7	37.9
生产服务人员	20.2	19.5	19.9	24.2
其他人员	9.1	8.6	9.9	12.7

参考文献：

- 曹凤：《第五次高峰——当代中国的犯罪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
- L. 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丁大建：《下岗人员与失业人员差异研究——从调查数据看下岗与失业的“并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劳动经济》2001年第3期。
-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科技司：《下岗及下岗统计研究》，《统计研究》1999年第3期。
- 李春玲：《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 李培林：《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 李强、肖光强：《“隐性就业”现象研究》，《新观察》2000年第5期。
- 莫荣：《就业：中国的世纪难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 R. 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 隐性就业课题组：《论下岗职工的隐性就业》，《西安石油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 张翼：《受教育水平对老年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4期。
- 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 Rifkin, J. , *The End of Work : The Decline of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 Tarcher/Putnam, 1995.
- Sen, A. ,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2000.
- Wilson, J. ,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gaco : University of Chigaco Press , 1987.
- Wright , E. O. and L. Perrone ,Marxism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97.

[本文责任编辑：冯小双]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and underlying basis of *fa* is impossible without insights into *li*. While *fa* stresses institutional aspects more, particularly after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ies, *li*, or *liyi* (propriety and righteousness), stands as the value goal or spiri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7) **Influences of Greek Philosophy over the Roman Law in the Late Republican Period :**

Technique and Content

Xu Guodong · 74 ·

An account is given of the influences of Greek philosophy over the Roman law in the late Republican period.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s and the Greek works that influenced the Roman culture of law, we argue that Cicerone's *Topica* played a key role in deriving Roman logics of law from Greek general logics. Greek logic was revolutionary i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Roman law. We have also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Greek historic-social philosophy on Roman law, in particular the spread of ideas about social contrac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ancient Rome. We conclude that today's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contains not only Roman and German elements, but also ancient Greek ones.

(8) **From Life's Adversity : " Human Capital Failure " in Re-employing Laid-off Workers**

in North China

Li Peilin Zhang Yi · 86 ·

This paper examines approaches to helping laid-off workers overcome advers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market demand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e argue that the increasing opening up and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plus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ve provide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adapt themselves to changes in the new reform period with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choice. Based on a survey sample during August and September of 2002 of 1,000 laid-off workers in 4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where resources have been exhausted, we find that, contrary to our hypothesis, laid-off workers suffered from "human capital failure" in terms of income decision,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attitudes. In other words, their accumulated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technical identity, work experience) no longer plays a role in improving their income level and rationalizing their social attitudes.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rupture of their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changing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market demands for knowledge. Therefore, aside from more job opportunities,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to provide more training courses to prepare laid-off workers for new posts in new trades, and to equip them for more choices in the market and help them overcome adversity.

(9) **Wang Chuanshan's Arguments on Intrinsic Goodness of Qi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ory**

of Qi in Song-Ming Confucianism

Chen Lai · 111 ·

Wang Chuanshan (a. k. a. Wang Fuzhi, 1619—92) argues that *qi* (energy-substance) is originally good; this serves as a foundation for his philosophy. His comments on *qi*-substance provide his philosophy with a cosmological basis, and above all, proof and expression of his arguments for its intrinsic goodness. It